

第一章 世家望族

一、绪言

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早期人类文明社会进化的重要标志，主要在于家庭与私有制起源的观点，可以看出人类发展史上由单个的家庭与聚族杂处而生相依的世家望族之间漫长的传继关系。因此，从潍坊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均可证明早在 8000 年前此地即有人类繁衍生息，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氏族、部落、家庭和世家望族的相继产生，更使得当地的文化在整个中华人类文明多元构成的格局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一）世家望族 风致高古

若从先秦时期数起，则据《孟子·离娄章句下》所载舜为东夷人，而生于诸冯的史实，可谓舜之族团应算是潍坊地区最早的世家望族。据考古发现，在青州的苏埠屯商代大型方国墓地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带铭文的青铜器，其内容以“亚醜”徽号为最多。凡此徽号既是方国，同时亦又是家族的。这是文献之外，考古所见潍坊地区商代最兴盛的世家望族，其人丁兴旺、繁衍发达，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文化艺术传统。再即寿光的古城出土的商代纪国有铭青铜器，其足以证明西周春秋时期的纪国世家是由商代发展而来，并且绵延千百年一直居处在潍河流域，为地方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尽管这种所谓“世家望族”，与后来汉唐、宋元以及明清时期的，有其内涵上的诸多差异，但若求之世家望族之由起，不可不视舜之族团为此事物之滥觞。

再按之春秋时期，明确见载于《春秋》、《左传》、《晏子春秋》、《史记》等历史文献的，则其中祖居夷维（今高密）的晏弱、晏婴与晏圉三代世家，则可称作潍坊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世家望族之典型。再降至汉代，则应推数郑玄、郑益恩与郑小同三代，甚至还可上溯其远祖郑崇、郑国，而《后汉书·郑浑传》则明记，崇为郑玄八世祖，“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还据考古发现的诸城凉台汉画

像石墓与高密孙仲隐墓志,可知与郑玄世家同时同境内,还有孙朗、孙根、孙琮、孙仲隐等孙姓世家望族。其中,孙朗位至司空,族人则有官居乐安太守、汉阳太守、侍御史、乘氏令者。

潍坊西境之寿光,汉代则有公孙弘世家大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有贾思勰、贾思伯、贾思同等名门望族。

根据中国早期奴隶社会所奉行的宗法制度,人们聚族而居,血亲维衍,故称述先世祖宗,必是注重攀附三皇五帝或文王周公诸先王大德,其内在注重的还是宗法制度所决定的一种传承有序的明晰的血缘关系。而降至汉唐以来,由于封建礼法制度的推行,遂使表示人们血缘关系的姓,以及与血缘或无关系的氏,两相通用而难辨祖宗。于是世间则由先秦的追述同姓血缘宗亲,而通变为讲求“郡望”。所谓“郡望”,则往往是指某族所生居繁衍的区域名称,这样不惟族氏族姓,而且连其所居处的区域也与之合并在一起,而作为一种综合标记,则比先秦单称族姓而明确科学得多。并且,此亦是人们所称“世家望族”之由来。

潍坊地区唐宋时期的世家望族亦是门户林立,因有战争或王朝鼎革而人们举族迁徙,但有郡望族姓为标记,其亦不会窜乱宗系。如五代的北海人韩熙载,其不仅是精音律、擅丝竹、孚人望,而且更是累累世家,名门望族。再如宋代的密州赵挺之、赵明诚世家,而赵明诚则更是以其学问为其世家颇增光辉名望的。宋代是我国金石学倡兴时期,一时朝野上下、名族庶士追慕金石渐成风气,其中吕大临、王黼、薛尚功、王俅、王厚之等各辑成有关图像或款识类的著作,而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共同编辑的《金石录》则以其体大、量博和门类齐全而向为学界所称道。尤其李清照,不但出身于世家名门,父祖人望,尤其其父李格非高官之暇,还做得一手好诗文,可谓世学家风,传承绵延;而李氏嫁归密州赵门,更以其女性的风采与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对生逢乱世的切身感受,而自成婉约清丽、凄绝悱恻的词话门派,而为夫家门楣增辉生色。

(二) 科举兴家 文标族望

潍坊地处北方濒海,及至宋季元代,由于位处南北势力的冲突频发之区,故而百业凋敝,致使许多历史上的世家望族,或辗转迁徙,或家道中落而风光不再。惟此不仅潍坊,恐怕当时整个北方地区的汉人士族大都难以脱此劫难。古人或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此即喻由于社会和家族内部的原因,一门兴盛不过五代,没有永远兴盛的世家。当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延至明初,则由于战争和历史以及土族迁入的缘故,遂使潍坊历史上原有的世家望族大的构成格局发生根本的变化。其特点即在于原有的大部的土著世家望族大都迁出或已败落,而随新王朝的建立,外来天下四方的新的移民,则又因于军功、学问或亲戚而在此繁衍兴盛,渐成新的世家望族的构成格局。

如明朝临朐的马愉,其或被当地称为明代江北的第一状元,自其由始,后世的子孙绵延,多是秉承祖风,诗书绍继,耕读传家,绵延历经清代,甚至时至今日,临朐作为全国闻名的文学艺术戏曲之乡,其内中与明代以来马氏世家的传导与躬行是分不开的。还有临朐的冯氏,最是地方世家望族、文脉兴盛、传承繁衍的典型,其祖上初为元代武职官员,至明代中叶由冯裕中进士而入仕途始,其家风绍继,子孙以文事而兴隆,自明季而至有清一代,冯氏一门以科举中进士者10人。临朐冯氏世家,虽其先祖由武官奠基,然其子孙一脉则更是以科举文章而炳彪于国史的。冯氏望族,历代以文事称胜,而最为著名者则推冯惟敏,其天性豪放,冠绝当时,虽未如同胞之二兄、五弟那样荣中进士,然而正

因其所处沂山、潞水、冶泉、海浮的山水灵运，和作为齐文化博大深沉的包孕造育，以及生逢明代季世，王朝之衰败，政治之黑暗，社会之险恶，更兼内忧外患交迭重聚，遂使之洞悉历史世事的目光更为敏锐，而悲天悯人的心肠更为凄惨，故激愤在胸，椽笔如刀，把亲所经历、自所目见之现实种种，以字字悲愤、句句血泪合写于词曲诗行。其作为冯氏世家望族的一员，以其豪迈的性灵、旷世的绝调，把历元以来的散曲写到了极致，这既为中华词曲诗话留下浓重的一笔，更为临朐的冯氏世家望族光耀门楣。并且临朐冯氏子孙，间或因逢明清鼎革，有的自辽东而播迁朝鲜，虽远离中华，但世家望族的门风尤振，他们留居海东，亦是以道德文章安身立命，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做出贡献。

其次，明清时期寿阳光阳河（今属青州）的刘翔世家，自其先祖刘八公从淮邳迁来，至翔时已历七世。刘翔秉承家风，锐意仕进，中进士，官同宰辅；精诗文，善书法。而其子孙刘铨、刘澄甫、刘渊甫、刘庚以及刘美声等，均是守祖训扬清风，而成一代名流的。其中刘澄甫、刘渊甫兄弟最负诗名，他们为明代著名的“海岱八子”，并且“八子”中的蓝田与刘澄甫为姻亲，即蓝氏长女，嫁与刘氏子士云为妇，亦是诗文联姻。刘氏一门，明清两代有进士8位、举人9位，可见家门文风之盛。

再即诸城的丁惟宁、丁耀亢世家。据考丁氏先祖值元明之际，而由武昌辗转至海州，后徙琅邪，子孙繁衍，是山东望族。据丁耀亢《述先德谱序》称：“世居诸城东海上藏马山之阳，瓜瓞繁衍，墟落冢墓，相望无别姓，盘亘六十余里……至先传御公，以科名起家，迄今文武者不绝，故远近称‘藏马丁氏’。”丁惟宁好文章，喜诗赋，诗句清新典雅，韵味隽永。丁耀亢以其文学巨著《续金瓶梅》而称胜文坛，并且由于时局变化和经丁耀亢等人的提倡，他们结成诗文学社，而参与其中相为勸勉，多是诸城地方的名门望族中最有文化修养者。

还有刘必显、刘桀、刘统勋、刘墉、刘鐸之、刘喜海世家。而此诸城刘氏世家，其不仅在山东，而且还是满清入关后天下知名的官僚世家望族，尤其刘统勋、刘墉父子官职最为显赫，均做到内阁大学士。刘氏一门，自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起，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百数十年间，中进士11人。而自明天启四年（1624年）刘墉曾祖刘必显中举起，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刘墉族侄孙刘源中举，近二百年间，刘氏一门中举35人。他们父祖勸勉子孙，昆仲扬励兄弟，以诗书文章起家，大都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之路。其中刘统勋的文章词赋，尤其书法结体方正典雅，自成一格。刘墉自承其世家为官、做学问和擅书法的良好传统，可谓如鱼入水，自能成其职显、博大与雍容。刘墉为《四库全书》的修纂，为整理中国历史典籍，付出心血。而其书法艺术亦曾冠绝一时，更为天下士人学子所倾慕。再到刘统勋的曾孙刘喜海，其身为高官，不事声色犬马，而专志收藏和研究金石文物，其收藏多而著述丰，是当时天下知名的金石学家。

又如高密的单书田、单青侅、单绍伯世家，其中单烺，据1935年《高密县志》卷十四上所记，单为乾隆丙辰进士，与郑板桥为同年。单烺，字耀灵，号青侅，又号大昆仑山人，累官知府，著有《大昆仑山人诗》二卷。高密单氏世家望族，有清一代出了不少文人高官，为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如高密的文学名家李氏三兄弟，即李宪璽、李宪騫、李宪乔，人称“高密三李”，他们是高密诗派的核心人物，文学成就影响山左，并为天下所知名，与天下名士袁枚颇有交往。而“三李”的成就与影响，则与单氏世家望族的奖掖是分不开的。关于此点，学界已有定评。

复如昌乐的阎氏世家，自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太原迁居昌乐，历世农桑，生计颇裕，至明后期，家道败落。自阎谏起而贫穷不夺其志，发愤苦读，中取拔贡，虽未继续仕进，但其诗文成就却“领袖山左文坛三十余年，声明籍籍遐迩，文章冠绝一时”。据载阎氏从明末阎谏中取拔贡起，至清季计有进士

7位、举人22位。关于阎氏世家望族的地位与文化影响，清同治元年（1862年）昌乐县令周寅青在《阎氏家乘》序中已有很好的评述：“其家类皆醇谨忠诚，笃雅有节。其秀者，绍累叶之诗书；其朴者，服先畴之田亩，彬彬然秩秩然恪遵礼法，罔敢失坠，余因是钦佩其家风。退而阅邑志诸传，知阎氏世多隐德，代有伟人，而五世七进士，尤昭人耳目，海内传为盛事。以余见闻所及，进士蝉联五世者，自巴县刘氏、仁和江氏、江苏宜兴吴氏外，恒不数觐，而阎氏顾七世科第。……诸父子祖孙并登甲榜，且以元魁为衣钵，以翰林为薪传。至贞宪公之德行、恭定公之勋猷、孝简公之理学，卓然与古之名臣硕儒并垂不朽，非徒荣耀一方，为阎氏之光宠已也。使非祖德宗功培植深厚，讵能若是哉。”

另外，有清一代，安丘的刘、马、韩、曹，诸城的张、王，青州的李、赵，寿光的李、张，以及昌邑的姜姓世家大族等，亦大都是由元明之际迁来居地，有的历明而兴，绵延至清，更多的则是繁衍称盛于清代。凡此诸多，不惟地方史乘，乃至省志、国史亦或有载，而民间历代传闻，亦是遍布乡里，耳熟能详。

（三）潍上世家 郭陈张丁

潍县的世家望族，更是颇具特点，一是其所居住的境域为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且自汉代以来迁延往复；再者封国、郡州、邑县代有传承，更是本土与外来文化交汇撞击生变之焦点。因此，潍县的世家望族，无论从其迁徙繁衍、生变发展，还是其所具备文化积淀与历代承继和弘扬，均是从今日整个潍坊地区着眼，仍或具有其典型与普遍之意义。

远且不论夏商周的斟灌、斟郛与寒国及平寿，单从汉代数起，其为北海国、郡延置治之中心所在，魏晋隋唐直至今日仍是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仅从明清时代算起，其作为“东莱首邑”，无论在当地、周边，及至州、省和国家之中，其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达的地位，亦更是周近诸县邑所不能取代的。

据潍县耆老所言，潍上的名门望族有：陈、郭、丁、张四大家，或又称丁、郭、陈、张。旧时人们或因潍上四大名门的为官大小、财富多少而称之为“四大乡绅”，当然，这与中国历史上素以缙绅阀阅，世家郡望的沿称传统亦是相延有绪的；但至民国以来，人们或放眼于国内，因有所谓之“四大家族”，而约定俗成相与比附潍上地方的，亦是谓之“四大家族”了。

我们的眼光审视在于历史的发展，即从潍县所谓“四大家族”兴盛发展的历史肇序来看，他们的顺序，大致或应是郭、陈、张、丁。

潍上郭氏世家的奠基人，应数明代的郭礼，其籍高唐，廩生、塾师。自明成化癸卯（1483年），携子来潍，设教馆于杜凤家门，后遂定居焉。郭氏子孙，秉承家学，又兼受潍上乡风人文之包孕，以诗书文章干谒功名。据潍上《郭氏族谱》所记，郭礼之前，其父祖可溯记至为一、二世，郭礼则为三世，迁居来潍，及至统序第六世，著门显族者则为郭礼之曾孙郭尚友（1569—1647年）。郭尚友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累官至户部尚书；迁潍郭氏，由此一孙而家门大振。尤可称点者，此郭尚友不惟诗书文章，而且其入仕之初“由威宁令擢主事，升部右侍郎，兼总督漕运”，后晋“户部尚书，绝侵渔裕国帑”。由此可见其是一位文武兼备的通才，而且还是善于理财、为政清廉的高官。并且，在其老迈致仕，归里林泉之时，又正逢明清鼎革风雨之秋，其不但未雨绸缪，资助潍上县令邢国玺易土城为石城，而且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不顾七旬开外，为保城阙整完，身体力行携其子孙

协助县令周亮工抵御清兵围攻，守城三月，终得完璧。凡此诸种，为免潍县城中生灵涂炭，为保宗庙社稷、建筑典籍、人文统序免罹灾难，而功莫大焉。自郭尚友起，潍上郭氏子孙，秉承家风，繁衍称胜，代有人望，真正成为明代以来的地方世家望族。诸如郭一璐累官至江西饶州知府，兴建“淡湖书院”，培植地方人才。郭伟业，精干练达，急公好义；郭伟勳笃志博学，著述颇多。明清数百年间，郭氏一门考中进士者8人，举人29人，秀才二百多人。为官者，一至七品24人，八至九品一百余人。郭氏望族人丁繁盛，宅邸连云，城中城外，园囿相望。郭氏望族绵衍绍继六百余年，数代振兴，间无或坠。其重教育、敦诗礼、因人施教，务成致用之才，不但在潍县地方，而且在山东，乃至全国均有影响。不仅在当时，而且时至今日，尤其在文化教育与艺术发展方面，仍起到突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若论潍上所谓“四大乡绅望族”的人才济济，宛若群星映耀，则当以郭家为最。

再即陈官俊、陈介祺世家，据《陈氏支谱·第一图》载：“一世，大观（按：左侧注：‘原讳大，一讳大观，原籍直隶沧州，因先世刺潍州，明洪武初遂隶潍籍’）。二世，友直。三世，士举。四世，宣。五世，轼。六世，昌。七世，缓。八世，懿世……”至陈官俊为十六世。在陈官俊以前，陈氏一门亦称殷实，由明而清诗书传家，不乏入仕为官者，但文名、职爵并不甚荣显。据《秦前文字之语·前言》称：“至伟堂先生而大显。伟堂名官俊，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以名翰林入值上书房，后为上书房总师傅，道光皇帝师，并授皇长子读。历任四部：工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累官协办大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于官。”若论官位高显，潍坊地区有清一代，可与陈官俊相比者当数诸城刘统勋。据《潍城陈氏世家简史》所载《潍城〈清代科甲出身名录〉中的陈氏家族成员》统计中进士者14人（按：此仅供参考，因此“名录”中潍上陈氏除陈官俊世家外，亦有其他氏族）。陈氏世家望族，以陈官俊官职最荣显，而学问声名影响全国甚至世界则无过乎陈介祺者。

又如张兆栋世家，其先祖亦从河北沧州迁居来潍，三世相继一门四进士，即张翔（兆栋叔父）、张兆栋、张兆楷（兆栋弟）、张禧（兆栋子）。其中张兆栋累官广东巡抚，并兼摄两广总督职。

复如丁庸行、丁克成、丁廷模、丁善宝、丁毓庚、丁锡纶世家。潍县丁氏世家，据考其与诸城丁耀亢同一始祖，俱元明之际从武昌，历海州而辗转迁于居地。按检相关家乘谱牒，潍上丁氏由一世迁入，绵延至丁锡纶为十七世，历明清两代，家道殷实，诗书耕读不辍，亦有人仕为官者，然均非显贵。但至十四世丁廷模，于道光三年（1823年）中进士，官至工部郎中，由此而贵显。大致到丁善宝在世时，丁家最为富足，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乡绅名门。丁善宝、毓庚、锡纶三代相继，尤注重传统文化教育，讲求诗文性灵的培养。而丁锡纶之弟锡田则成为国内知名的历史文献学家。

潍县还有晚清自胶县城中姜市迁来的柯蘅、柯劭忞皆入翰林。柯劭忞，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湖南学政、贵州提学使等职，民国后任清史馆馆长等职。其最大学术贡献是著有《新元史》257卷，另有《译史补》、《新元史考证》、《文献通考注》、《谷梁传补笺》、《文选补注》、《尔雅补注》、《蓼园集》和《清史稿》等。柯氏一门，祖孙、父子、兄弟、姐妹，甚至姻娅亲戚俱是大有学问而名垂青史的。诸如柯劭忞之子昌泗曾正式叩拜罗振玉门下，专攻金石文字之学；昌泗之二弟昌济，著名古文字、历史学家；三弟昌汾联姻孔门，为衍圣公孔德成之姐夫。

（四）文章教泽 百代传承

据《潍县志稿》卷十二《民社·氏族》志称：“潍县氏族可考者，以坛、姒为最古。寒亡于夏，坛

已无传；周灭斟郢，妣亦不著。降及汉魏，平寿大姓无闻。洎永嘉之乱，旧族率多南奔……亦均不知。今所称旧族，往往本源难溯。明初迁河北、山西、云南之民于山东，复徙登莱之民于东昌诸郡。迄今谱牒或亡、传闻失实，因多冒为明初徙民。此潍县氏族之大概也。”以上所述，未尽确当，然其推考，大致可信。我们在前面所称述的潍坊地区的世家望族，自三皇五帝之季，历先秦，绵汉魏，降迄唐宋，而又明清者，其或文献有载，亦兼考古新证。而因于三百年文化研究之时限，重在明季与有清一代。并且明初徙入者，旧所幸存土著，均因元代离乱，故一时发展难成巨族。按之史乘，最早之望族亦或出现于明季。前所揭列之临朐冯、寿光刘、诸城丁、潍县郭等世家望族，其氏族振兴，渐孚族望者，大致亦在明代中后期。这种氏族聚居，繁衍称盛于此历史阶段的现象，亦是由历史的发展与民族矛盾的冲突以至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地方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而入清代又复再兴起者，亦大多都在乾嘉或之后。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至全省，当时比较著名的世家望族，则有黄县的丁氏、栖霞的牟氏、莒县的庄氏与章丘的孟氏和惠民的魏氏等等。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县志》称：“诸姓在清中叶，乡人有丁、王、姜、逢之称，盖以财富言也。”以黄县丁氏之富，较之栖霞牟、莒县庄、章丘孟与惠民魏则当归为一种类型。而潍县之丁氏，虽是清代中期以后渐成地方首富之望族，然家风尤重诗文教化，代有文人学士；黄县丁氏则清代晚期出现如丁幹甫、丁佛言等知名学者。黄县之丁人称“百万”巨富，《黄县志》载：“山东言富者，德望惟推丁氏焉。”“名家世为婚姻，此风已久，以丁之与姜，王之与丁姻戚为最多，故休戚关系亦深，习尚性情亦有相同之点。其兴也尽由商业而至，清末商业俱败，诸姓遂同时衰落。”此言中的，可以看出，不仅黄县丁、姜、王、逢，其他各巨族亦是以商业或土地财富而称盛。潍坊地区之世家望族，其突出的特点，则在于是以诗文育子弟，以科举入仕而兴家，以道德文章而振族望。古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其中临朐冯氏则绵衍明清六百年间，出有10名进士，众多著名文人。寿阳光河刘氏一门8名进士，其他诸如昌乐阎氏四世7名进士，潍县张氏三世4名进士，郭、陈诸氏一门8名或十余名进士。总括而言，像临朐冯氏以文学称盛两朝，早已远逾“五世”，可为一种特例。

潍坊地区的世家望族之贡献，尤其对地方文化风气的影响与推动是大为有力的。诸城、临朐的丁、冯两大世家，其于文学、词、诗话，不但在山东，而且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均占一席之地；寿阳光河刘氏与“海岱八子”则匡正有明一代之诗风，使之由拘囿至复古，而渐入直抒性情、自然清新之妙致；还有高密李氏三兄弟，亦是诗名文章炳彪于山左的；潍县郭氏、诸城刘氏，其子孙的文化艺术修养，不仅擅名于当时，如刘墉之书法，郭伟勳之印篆等，推动了地方文化艺术的前进；潍县陈氏的金石考古之学，丁氏的历史文献之学，这不但在当地，即令在全国亦是名居前列的。

再者，潍坊的世家望族，往往注重强调道德文章，注重儒家的克己修身。据陈继揆《毛公鼎旧事》称陈介祺：“曾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而丁善宝的《十笏园记》中则告诫子孙以耕读传家，“毋得藉此会匪朋，毋得藉此演杂剧，更毋得藉此招纳倡优博赌，滋生弊端，使泉石笑人”。昌乐阎氏则注重人的至高性灵“元气”的涵纳与修养，要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尽管陈介祺三条训诫，今日看来不是切合实际，但由此可以看出潍坊世家望族所奉行的人生哲学核心，与其周近地区之同时代世家望族之大不相同。

这些世家望族往往急公好义，尤其在地方有难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如诸城丁，高密李、单，安丘刘，潍县郭、陈、丁氏等。这些世家大都逢清兵越海来攻掠城邑，他们都是祖孙相勉，出钱出资或

父子兄弟齐上城头，不避矢镞刀枪，几乎每族俱有战死者。如陈介祺的从弟陈介眉原任河南归德府知府，能在捻军攻城时，率团勇冲出城外，为捍卫乡邦安宁，战死城郊。据《潍县志稿》卷二十九《人物·义行》载丁克成及其四子：廷模、廷选、廷举与廷珍，俱是父子相继一门善行：丁克成“捐巨金施粥，全活数万家”；丁廷模“戚族中，贫不能学者，为延师具膏火”；丁廷举“设义塾，延师教贫人子弟”；丁廷珍则修桥、筑城，捐次筹防，“七年不辞劳瘁”。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重修石桥记》碑文称，位于东关碧霞宫外的石桥三十余板，因创建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年久，故邑人丁克成随时修补。后由丁克成诸子倡导捐资鸠工而修固。又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修万年桥碑记》称，由丁毓庚重修，并谓：“丁氏之先之为此举者，数世于兹矣。”下则揭列丁克成及其子孙四世绵延修护一桥，功莫大焉。他们这种急公好义，修桥筑城，解救危难的家族风格，亦为提高其世家望族的威信地位做出贡献。

最后，则是世家望族的文化影响，由于他们不但注重自身世家望族子弟的训导与教化，而且尤热心地方的文化教育，故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世家望族中多有进士，而寒庶之家亦出状元。陈介祺接纳曹鸿勋为义子，奖掖其学，并在与时任礼部侍郎的潘伯寅和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的信札中，多次推荐曹氏的人品学问，使之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状元。而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曹鸿勋原同居一条巷子中的王寿彭亦中状元，这条寻常巷陌，二十余年连中两名状元，一是个人努力，而于地方文化的影响更是分不开的。诸城、高密、临朐的世家重文学艺术，今日三个地方，尤其临朐是全国闻名的戏曲艺术之乡，上溯其源，此与冯惟敏的散曲艺术和其世家的影响密切相关。诸城自宋代苏东坡知密州，重诗词文学，而后到主要由诸城丁、张子弟等组成的所谓“十老”之提倡，直至今日文学大兴，闻名全国的文学艺术家多出自诸城。潍县自明周亮工则重印篆与绘画艺术，至清代郑板桥，招子庸相继推掖，再兼潍上郭氏子弟的身体力行，遂使之篆刻、绘画天下知名，时至今日，其风更炽。陈介祺的金石之学，带动潍县甚至齐鲁与全国，而好古收藏之流风余韵，至今仍在潍上蔓延。

二、临朐明清著名冯氏文学世家

在文学史上常见有父子同名于文苑的现象，诸如：南北朝时的庾氏（肩吾、信）父子；五代时的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北宋时的三苏（洵、轼、辙）等。他们几乎文有同宗，诗有同调，词有同格，成为文苑一时之萃。兄弟并辔驰骋文坛者，在文学史上亦屡有所见，又如：建安时的应氏（珩、璩）；西晋时的二陆（机、云）；明末的三袁（宗道、宏道、中道）等，皆成为文坛一时之雄。而祖孙相继，家学相承，独树一帜，流芳遐迩，甚至成为独具文采的文学世家，在文学史上虽不多见，但也有出现，如南朝“王融前后四世有籍，则祖及孙、曾俱以诗名于时”；明末的“吴江沈氏”（璟、自晋），也是赫赫有名的文学世家，对我国古代戏曲理论和戏曲创作都有重要影响；而本文拟作阐论的明中叶后的“临朐冯氏”，也同样是一个颇负盛名的文学世家（此乃孔繁信著作观点，以下类似称引，仅附作者姓名，详引则见节尾参考书目）。

临朐冯氏，又称“北海世家”。明后期“彼父子质行齐鲁，诸儒莫及”，有所谓“五世其昌，莫与之京”（李维桢）的说法，由此可见其“文学世家”声誉之尊。

(一) 明中后“文学世家”兴起

“古者一国之势，原于始封；一家之风，开于始祖。”冯裕乃明清临朐冯氏文学世家的开山人物。

冯裕（1479—1545年），字伯顺，号闻山，祖籍临朐县仁寿乡（今盘阳）。其先祖冯才兴是元代万户侯。明洪武二年（1369年），“诏简山东之民三户徙一人戍辽”，冯才兴之长子思忠应征赴辽东广宁左卫十三站五家屯守边关，任指挥僉事。后传五世至冯裕，其刻苦读书，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历官华亭、萧县知事、晋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百姓设生祠以祭。又升南京户部员外郎，迁郎中，改平凉知府。因不便携眷，便留长子惟健奉母居青州，返祖籍临朐，只带次子惟重和四子惟敏赴任，以便课子研读。再调石阡知府，升贵州按察司副使。逢苗酋内讧，互率数万众将械斗。裕单骑赴苗寨，平息纷争。然裕尝谓：“希宠者负君；媚人者负己；谋身者负人。平生盖三无负矣！”其当官抗直，不为当道所容，遂辞官归里。

冯裕退隐益都，家居讲学，尤好吟诗。他与海岱耆宿石存礼、蓝田、刘澄甫、陈经、黄卿、刘渊甫、杨应奎等，于青州北郭禅林寺结“海岱诗社”，吟诗唱和，遐迩闻名。后裕之曾孙冯琦辑冯裕等8人诗作为《海岱会集》，付梓传世。内收冯裕诗128首，后别为《方伯集》，又编入《五大夫集》与《北海集》。

冯裕为诗古朴自然，毫无雕琢之气，多学“诗、骚”之风，常习乐府旧题。诗发性情，感事而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三杨“台阁体”诗风蔓延之时，也是“前七子”以复古为旗帜，起来反对“台阁体”之际。冯裕及其他“海岱诗社”成员并未追随“前七子”的复古道路，而是各以其坚实的诗歌创作基础，沿着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道路，以抒写性情，为其自然之趣，而创作了不少面目清新的作品。故魏允贞在《海岱会集序》中写道：“《海岱会集》自远寄至，读一再，对景言情，即事属辞，质而葩，逸而典，清新而畅，不矫不艳，异乎今君子诗矣！”此评虽不无溢美，但“异乎”当时“君子”之作，却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击中了“台阁体”和“前七子”的要害。冯琦在《海岱会集引言》里则更加透彻地写道：“八人的诗作质朴闲雅，无‘三杨台阁’之体，‘七子’涂饰之派。”观点分明地指出了青州诗人“盖抒写性情，自适其适，不随风气为转移”的创作宗旨与特点。这就进一步说明“海岱诗社”的创作思想、观点、态度乃至宗旨，是提倡抒写“性情”的文学主张。这与其后来的汤显祖、徐渭、冯梦龙以及三袁所倡导的“性情”、“性灵”说，都是一脉相通，并且成为他们的先声和启迪之响的。由此即可窥见《海岱会集》的编辑意义和时代作用了。

冯裕诗作对其子孙的影响，更是不效无病呻吟，每感事而作，愤世忧民，作品极具人民性，为民鼓吹与呼吁。如诗《战城南》：

“前岁战，在云中，今岁战，在辽东。玉林塞南穹庐满，广宁城边人烟空。年年春草腓更绿，不知征战何时穷。将军枕戈黄龙戍，天子旰食甘泉宫。忆昔虏庭绝漠北，焉支祁连入中国。迩来胡马渐南浸，河外三城收未得。朝出战，暮忘归，别新婚，远庭帏。忠臣义士心所希——但愿黄金印似斗，宁辞白骨甘如饴。”

又如七言古诗《谷贵叹》：

“齐东野老行叹息，枵腹杖犁脚无力。忽闻官余到城中，赤手低眉泪沾臆。往年斗米数十钱，今岁青肤百余翼。稚子奔波类鹄形，瘦妻伶仃如土色。革门采摘啖蔬甲，中户经营卖首饰。大麦未黄小麦青，东邻已窜西邻路。三春无雨口嗷嗷，百里绝烟心惻惻。命危未免委沟壑，病起犹来看稼穡。菽粟由来价转高，蚕丝屈指抽未得。炎疹流行可奈何？苍天胡为至此极！……”

冯裕为官关心民瘼，56岁时，两袖清风辞官归里，靠长子惟健维持生计。因此，他自会感同身受地写出“齐东野老行叹息”的诗作，这亦正是诗人作品的情感之所在。

冯惟健（1501—1553年），字汝强，改汝至，号陂门，又号冶泉，冯裕之长子。他少年随父官南京，即负文名，曾与陈凤卢、许石城、邢雉山等结文社于青谿之上，被推为祭酒。及父调平凉时，奉母居青州。27岁中举，郡人慕其文采，群相仿效，声誉益起。及父致仕，囊橐萧然，贫不能自给，惟健转以心计经营生产，供奉二老，照料弟妹，凡婚嫁大事，皆一手操力。

惟健曾七上春官不第，便业余致力于诗、古文及词赋写作。他古体诗宗“骚选”，近体宗开宝以上，杂文深原尔雅，无文人浮薄气。著有《陂门集》，收入《五大夫集》。其亦不乏关心民间疾苦之诗作，如《观刈麦》三首：

“望雨还收麦，甘贫独感时。虽无高廩入，已共物情怡。
泽沾三白人，谁复颂雨岐。山农得佳穗，遥想献丹墀。

阅世珍农作物，行歌绝稻粱。春云看荷插，晚日坐移床。
削水何能似，遗舟意不忘。悠然咏梁甫，敢谓在南阳。

流浪悲生事，开山翻自怜。三春惟二麦，白日到青阡。
旧是辽东隐，新耕稷下田。夜来官税急，得免贷租钱。”

诗中写“山农得佳穗”，也曾“遥想献丹墀”以谢皇上福荫。但“夜来官税急，得免贷租钱”——官税重且急，就连贷租钱都交不起了，又何以度日？惟健图谋大家庭生计，当不乏真情实感，故其诗作感人至深。

冯惟重（1504—1539年），字汝威，号芹泉，冯裕次子。他10岁属文，观书数行俱下，有会于心辄手录之。弱冠补辽东广宁卫庠生，还籍临朐而居青郡，齐鲁间执经为弟子者甚多。其刻意为诗，华丽典雅，无大历以后语。书法道劲朴茂，有晋人笔意。35岁时与五弟惟讷同榜中进士，其授官行人司行人。任职甫及一年，1539年春，明世宗南巡安陆，惟重奉旨前行告祭湖湘，冒暑疾行，至庐江时疽发于背，不治，死于庐州。时其子履生不足百日。

惟重夭丧，留诗不多，但其诗“清新俊逸，直逼盛唐，特未深厚耳”。有《大行集》传世，由孙冯琦辑入《五大夫集》和《北海集》。兹引其《驾狩承天》：

“万乘旌旗入楚都，重看天地启苞符。
三湘云物迎仙仗，七泽风烟接御炉。”

北极星辰临翼轸，西陵弓剑在枋榆。
不知汉帝龙飞后，曾得奎舆幸代无。”

又《九日登镇淮楼》：

“镇淮高阁锁烟霞，徙倚层栏俯万家。
地近楚乡仍戏马，人如汉使久乘槎。
登楼南国怜王粲，落帽西风忆孟嘉。
海上东篱更存否？愧将短鬓负黄花。”

惟重之诗用典比兴，对仗严谨，辞章华丽，足见大气，但可惜“乘槎”夭丧，未留更多深沉之作。

冯惟敏（1511—1578年），字汝行，号石门，又号海浮，冯裕四子。他幼显聪颖，为文闲肆，万言立就。少年即踪迹遍五岳，南入黔，北渡辽，广见多识，才华名噪一时。27岁乡试夺魁，但第二年与二哥、五弟同入京会试，惟其落第，意冷心灰。五弟惟訥为其“求田问舍”，始居于风光旖旎的冶源薰冶湖畔，遂结交章丘文人李开先、青州兵备副使王世贞和散淡文人雪蓑等，文章才气扬名海内。曾应临朐县知事王家士之聘，撰临朐第一部县志——《嘉靖临朐县志》4卷。他目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时山东巡抚监察御史段顾言为官贪酷，民甚苦之。惟敏以散曲作品直讽段顾言，竟被逮往济南，身陷囹圄达两月之久。即使在获释后，也仍受迫害，连其举人俸禄都停发了。但他毫不退缩，仍写了《七行歌·怀凤洲使君》和《多纠缠》，以发泄横遭贪官污吏迫害的愤懑。

冯惟敏让残酷的生活现实激发了终要做一个爱民清官的愿望。他以52岁之年晋京谒选，以非凡的才华博得朝廷赏鉴，授官涑水知县。尽管他使涑水“百里改观，治绩为贵”，但也难免因秉公执法而得罪那些兼并土地的中贵人，而招致谤讟，仅为官一年，就被解官归乡。后甄别起复为镇江府学教授。曾以才学富赡之名应滇闾之聘，录文多出其手，一时传颂。升保定通判，奉檄修府志，秉笔直书，搜集前兵部员外郎杨继盛遗文，犯当朝之忌，左迁鲁王府审理。惟敏怒不赴任，回故里，年已62岁。

因惟敏“怒不赴任”，而朝廷则给予“官场除名”。他感事作《折桂令·阅报除名》：“喜朝中一旦除名，俺才是散诞山人，自在先生”，“笑吾天地之间，半纸功名，六品五官，百样参差，十分潦倒，一味孤寒。破砂锅换蒜皮有何稀罕，死鸡儿熬白菜枉受艰难。从今后云水青山，竹杖黄冠。远离了世路风尘，跳出了宦海波澜……”其以一个苦涩的“喜”字，对待朝廷的“除名”。

冯惟敏退隐之后，在薰冶湖畔度过了六载晚年生活，虽已患脑疾，但仍不辍写作。这位历尽艰难、仕途坎坷的正直文人，尤能透彻地认清朝廷的腐朽本质。他以辛辣的笔锋，直触官虎吏狼。如段顾言虐政山东，甚至强掘民冢，以取随葬金银。冯惟敏写《吕纯阳三界一览》：

“有钱的快送来，无钱的且莫慌，寻条出路翻供状。偷与我金银桥上砖一块，水火炉边油两缸，残柴剩炭中烧炕。若无有这般打点，脱与我一件衣裳。”

“写的是鬼界，骂的是人世。贪官刮财，敲骨吸髓，死人也不放过……《骷髅诉冤》、《财神诉冤》假托骷髅、财神之名，对社会的黑暗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郑树平）。冯惟敏郁愤久居民间，

更能感触至深地写出许多为民呐喊的思想性极强的作品。如散曲〔玉江引〕《农家苦》：

“倒了房，堪怜生计蹙，冲了田园，难将双手抗。陆地水平铺，秋禾风乱舞。水旱相仍，农家何日足？……”

又如〔胡十八〕《刈麦有感》：

“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花户每比粮。卖田宅无买的，典儿女陪不上……”

又如诗《易水上候刘刺史未至怀古感今漫赋》之三：

“不愁饿死似前年，谷贱伤农倍可怜。
握粟出村终不售，寡妻何处觅官钱？”

冯惟敏的散曲作品风格，继承了元代豪放派的传统，因被誉为曲坛上的辛弃疾。称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在其《曲藻》中赞道：“北调近时冯通判惟敏，独为杰出，其板眼务头、擗抢紧缓，无不曲尽，而才气亦足发之……”

冯惟敏也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的杂剧代表作有《梁状元不伏老》和《僧尼共犯传奇》。前剧是他以切身感受写了剧中人物梁颢 80 岁才考中状元。这对封建科举制度是一极大讽刺；后剧则写了僧尼私通而被揭出，小吏虽也借机敲诈勒索，但他终因顾忌自身的“惠政”而不予上报，判僧尼还俗，使其成就了真夫妻。作者透出观点：“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传留后代，繁衍至今”，乃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其以“真性情”向“假道学”公开宣战，彻底戳穿程朱理学的虚伪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与后来汤显祖的《牡丹亭》剧中“情”对“理”的斗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冯惟敏通过这些感人的作品，明确地宣告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是“性情说”。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评冯惟敏的杂剧《梁状元不伏老》当在王九思《杜甫游春》之上。陈田在《明诗纪事》评诗云：“临朐四冯，诸中应首推汝强（惟健）诗；王秋史谓汝威（惟重）为四集之冠；朱竹垞谓汝言（惟讷）诗华整可观；余谓终不如汝行（惟敏）之才气纵横也。”任中敏《曲谐》中赞曰：“论才情纵横，气象万千，明曲中真罕有敌海浮（惟敏）者……高趣涵空，英姿飒爽，又纯以跌宕风流，渊雅沉穆，而本来踔历蹈扬之面目，则收拾净尽，一毫不露，才人之笔直无往而不取也。”冯惟敏被公推为“曲坛豪放派代表人物”，“堪称明代散曲第一大作手”。在明清临朐冯氏文学世家人物中，官衔大有出惟敏之右者；但他却惟能名登《中国文学史》而独树一帜。当其二哥惟重尸骸自庐州运回，又使七弟惟直过悲即丧时，惟敏悲愤交加，作七绝诗一首：

“重华巡狩四时游，十二山川十二州。
敕使御香分道出，我皇端拱事玄修。”

诗中拿专事玄修而出游的嘉靖帝与因治理四方而巡行天下的舜帝相比，笔锋如箭，直射当朝君王。自古作家重在胆、识、才、力，由此可见，惟敏之胆可谓大矣！

冯惟讷（1513—1572年），字汝言，号少洲，冯裕五子。25岁中进士，历官宜兴知事、扬州府同知、松江知府、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1571年春，他晋京入觐，路过保定，探望四兄惟敏，就慨叹：“凡承宣使者，还职十二，罢去十三……”已与四兄约同归隐。但他被委任光禄卿，为吏部评鹭官属，“与太宰廷辩，不少依违”，遂辞官归隐，当年即病逝了。

惟讷一生著述颇丰，有《光禄集》、《风雅广逸》、《楚辞旁注》、《诗选约注》、《文献通考纂要》和《杜诗删注》等。他对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的成就是惊人的——他辑录的《古诗纪》156卷和《风雅广逸》8卷，并收入《四库全书》，被时人称为《昭明文选》的并轡之作。此二书的主要功绩，正如《四库书目提要》里所说：“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不能外是书而别求，因亦采珠之沧海，伐木之邓林也。”虽然该书搜诗芜杂，但却成为后人研究六朝以前诗歌的最宝贵的模本。近人丁福保所辑录的《全汉三国晋魏南北朝诗》和逯钦立编辑的《先秦晋魏南北朝诗》，皆多从冯惟讷之作中剖璞成玉；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中，上古至南北朝部分，也多参照此作。后人多推戴冯惟讷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名家，为传播我国古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光禄集》诗，“取法开宝”，雅致冲淡，亦多有感之作的佳篇。如《塞下》：

“日落胡沙惊，匈奴已合兵。天山万里月，一夜度龙城。
却敌心逾壮，衔恩命自轻。左贤今已缚，不复请长缨。”

惟讷曾任兵部车驾郎，备兵陇右，其儒将气壮山河，诗情溢于言表。再如《闻警》：

“八月塞门开，单于猎马回。五月秋草尽，万骑羽书来。
秦陇疮痍后，疆场战伐催。黄云迷处所，羌笛暮生哀。”

惟讷诗作气象高古，涉笔圣汉，大漠风沙，与金戈铁马跃然纸上，读之如闻胡笳号角声也。

冯惟讷为官三十四载，愤感朝政，虑国忧民，亦不乏感怀诗作，如《毗陵舟中夜别万吴二明府次俞汝成韵》：

“度口云深树色苍，孤舟寒雨共离觞。
凭君莫话从前事，只是无言已断肠。”

冯子履（1539—1596年），字礼甫，号仰芹，冯惟重之子。29岁中进士，历官直隶固安知县、兵部车驾司主事、山西按察佥事。他文武全才，曾在大同与番酋把汗那吉比赛射箭，令其心悦诚服而不敢犯边。但官场倾轧，使子履愤而辞官。后鞑靼入侵西宁，朝廷又下诏子履起复和州知州。子履仍衔旧怨，本不情愿起复，但其叔兄弟及挚友却再三相劝，并邀子履同游东镇沂山。在百丈瀑布东边的仙客亭中，藉酒谈心，以启其志。官任辽东都司的五弟子复（冯惟敏之长子）兴致所至，吟诗《沂山观泉》：

“高山一上一徘徊，前度登临今又来。
缥缈银河萦碧洞，凄清玉漏滴苍台。
楚江南去孤帆远，沧海东临一镜开。
坐啸峰头遥指顾，五云生处是蓬莱。”

子履对起复和州尚未意决，把酒吟一首《游沂山与客共酌》：

“悬崖瀑布喜相过，樽酒山亭意若何？
与君且莫徜徉饮，世上于今醉者多。”

冯子咸（行八）举人，子履伯父惟健之次子。他中举人后，感悟“情非奉檄，礼非翘弓，何数数千禄为”，便不再发奋考取进士，依居冷水，设帐教读。子复二弟子升（行六）之长子冯瑗，就是跟随八叔子咸读书，后中进士。子咸虽不看重官场仕途，但他却愤感于8年之前三哥子履所受的那场中伤之气。此时，子履长子冯琦已在朝廷充经筵展书官，若子履再奉诏起复，父子俱荣，不就是对当年政敌陈三谟的一记响亮耳光吗？为此，子咸也随和五哥子复之意，步其韵，赞和一首《沂山送别》：

“名山作镇亦雄哉，数载相期始一来。
南控穆陵天险在，东连沧海玉屏开。
悬崖不断三秋雨，落石时惊万壑雷。
高畔不堪分袂处，暂将樽酒共徘徊。”

此诗写景言情，描述沂山百丈瀑布景观，引申状元赵秉忠的《观沂山瀑布泉》中的“惊闻万壑雷”诗句，更成子履“不堪分袂”；又怨其仍不意决而“共徘徊”……子履经兄弟挚友苦劝，才毅然决定起复和州。又作一首《和前韵》：

“寒风渐渐岭头过，把酒其如分袂何。
极目楚天征旆远，穆陵回头夕阳多。”

子履东山再起，又历官和州知府、陕西按察司佥事、山西参政、河南副使，先后兼治大课、易州，民立生祠以祭，升河南参政。为祝太后万寿节入京师，感子冯琦已官任少詹事，遂执意退隐。家居常课小儿读书，或与诗友雅会。乡居3年病故，享年58岁。

冯琦（1558—1603年），字用韞，号胸南，四祖父冯惟敏观其大才，取“玉不琢，不成器”，为改号琢庵。祖惟重，父子履。20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经筵讲官、右春坊右谕德，历主乡试、武会试，升礼部右侍郎，改吏部侍郎，升礼部尚书。他“明习典故，学有根柢，数陈说论，中外想望风采”。以《肃官常疏》、《矿税疏》等文章闻名于朝野，每有疏奏，出入竞相传录。万历帝“亦深眷倚，虽难悉从，但常对冯琦深语欲涕”。他曾两度被举荐入阁，皆因权臣沈一贯之妒，使琦入阁受阻。他勤奋国事，在病危时，有西羌使者送来战表，帝知羌人素惧冯琦韬略，便亲自从病榻上扶起冯琦，

太子磨墨，冯琦间歇三次，才写完“回文”诗信。蛮邦知琦健在，未敢兴兵进犯。此即“一篇回文退蛮兵”（《冯氏世录》）。他临死口占《绝命诗》：

“浩渺天风驾海涛，三千度索向仙桃。
翩翩一鹤青冥去，已隔红尘万仞高。”

冯琦46岁去世，20年后，明熹宗朱由校还每每追思冯琦之功，曾六次遣官来益都西五公里之尧王山东麓冯氏祖茔，为冯琦立碑祭祀，谥“文敏”，追封入阁，故有“死后入阁，冯琦一人”之说。

冯琦才华横溢，于学无所不涉，而以实用为之，故其文章有关世务者多。其游记散文直追唐宋八大家风格，清新天然，不饰雕琢。有人论其风采类汉代李膺，器量类宋代韩琦（其出生之际，父梦韩琦入室，故为起名“冯琦”），才识类唐代陆贽，议论类宋代苏轼，先见远虑纯心体国则类宋代李沆、司马光。此论虽不免有过誉，但观其一生经历、文章、事业，皆有相似之处。廷臣士子更称赞冯琦为振兴内翰之杰：自明代以来，“吴中四杰”首辟文坛。后来便是“七子横鹜，平凉、晋江、毗陵、新都并操蠹孤，雄据艺苑”（傅国《昌国榷》）。“而关中、城都仅当一队，论者谓内翰无文章”之际，冯琦“以仙才海学起中秘，与王文肃先后振之”，“自是斯文柄复归内翰”（于慎行《宗伯诗集序》）。可见冯琦在当时文坛地位之重要。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文著称，诗意敏捷奇伟，文风清新雅致。他留有《宗伯集》81卷，其中，诗三百余首，记、序百余篇，奏、对、论、策百余篇。他的五古、七古，大有“乐府”、“建安”之风。如《燕歌行》的开头：

“石粼粼，草斑斑，边城五月如秋寒。渺渺平沙几千里，天风吹暗燕然山……”

开篇自然流利，浑厚淳朴，视野开阔，劲切有力。他的五律、七律，写得豪壮雄健，慷慨昂然，似有王龙标之气。如五律《送王大理兼宪职阅视延绥》：

“迢递延州路，风沙古战场。地当左冯翊，塞直右贤王。
飞将摧骄虏，悬军出大荒。那堪分士马，辛苦戍渔阳。”

尽管是赠言，可谓气势恢宏，浩荡千里，苍劲雄奇。故大学士于慎行在其《宗伯集序》里写道：“至若有韵之文，则古出建安而下，逮于唐，而旁薄于杜，又当世所不几者。”这对冯琦的诗作风格作了较为实际的品评。

冯琦之文，博采众家之长。就山水游记而论，有清新天然之感，婆娑秀美之气。他的《游冶源记》尤为山水之名篇：

“冶水出冶官祠下，注于湖，疏为河，以入潞水。湖曰龙湾，当海浮山下，相传为欧冶子铸剑池。澄泓见底，可舟可泳。泉自湖底仰而上浮，如贯珠匀圆万颗。水烟奄霭，细如薄雾，水升降与海汐相应。其南有潭绝深，作蔚蓝色，投之以物不沉。湖可三亩，树环之。泉分道下注，非丝非竹，环珮琤然……”

这段写景叙述和描写，条理清晰，读之如身临其境。傅国在其《昌国榦榘》中评曰：“四六以欧宋之神，写徐、庾之色”，“涵浴万象，贯穿千古，子瞻（苏轼）之后，无可儗者。”

他的论说文，说理精深透辟，“论策尤为独步，如黄河一派从天上来”，气势凌厉。以犀利之笔，俊爽之语，言事敏锐，一气而下。如《矿税疏》，上书直陈其事，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现状和中使奸徒不顾国难、误国害民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语虽不刻，犀利备至；话不过饰，句句着的。所以，于慎行的《宗伯集序》中称“其指画政体，陈说机宜，密策决于一言，硕画陈于万里，名实其中，权正相资，韩也而无之也”。此评虽有溢美，却大体合宜。

冯琦的文学观极为鲜明，从他编辑《海岱会集》、《五大夫集》和《北海集》等，就表明了他反对“台阁体”和“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他提倡文学“吟咏性情”，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故于慎行《宗伯集序》里说：“近世名家辈出，非先秦西京口不得谈，笔不得下，至士直赵宋之言，目为卑浅。”这里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七子”、“名家”文风日下的弊病和恶劣影响。并指出他们所宣扬的学习“汉魏”是“徒皮相尔”。同时，肯定了冯琦的创作，真正发扬了我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精髓。评冯琦“公之为古体，渊源汉魏，而轶出于唐；其为近体沉浸盛唐，而致极于杜，兼备众美而出”。尽管这些评论亦有夸饰之处，但对他的文学观点、态度，以及对后人的良好影响，评价是正确的。

冯琦博闻强记，每读书便有摘录，辑资料数多而面广。他取《册府元龟》之义例，编成《经济类编》100卷。原稿分4类，可惜书未成而琦已卒。其堂弟冯瑗及其门人周家栋、吴光仪复加整理，分类排比成书。此书分帝王、政治、储官、宫掖、臣、谏争、铨衡、财赋、礼仪、乐、文学、武功、边塞、刑罚、工虞、天、地、人伦、人品、人事、道术、物、杂言等23类。杂史、诸子百家，无不辑录；故事、文章，均有收载。资料直采原书，颇为浩博。明万历三十年（1604年），杭州南屏山始刊本，收入《四库全书》。至1968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20册本行世。此书一向成为“官家经国济民之备”。

冯琦去世之后，就连曾妒其才而两度阻其入阁的沈一贯也深感愧疚。他亲为冯琦撰神道碑，写道：“嗟夫人之生也，咸贤之甚难；感贤之而可信于后来者尤甚难！公之早逝也，天命也夫！余屡陨涕而为之碑……”沈之强颜“陨涕”，亦可知冯琦之早逝，在宫廷官场影响之大。

冯瑗（1572—1624年），字德韞，号栗庵。冯惟敏次子子升之长子。他幼从堂叔举人冯子咸读书，为文道健。24岁中进士，历官湖广茶陵知州、泽州知州、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出监两浙漕运、云南司郎中、山西参政、开原兵备道兼河南布政司。开原位于辽宁省北部，西靠蒙古，北、西、东三面邻辽邦，孤悬斗绝。当时，后金努尔哈赤已经十分强大，屡屡犯明，边事方棘；又加连年逢大饥，民不聊生。朝中有宦官魏中贤开始秉政，朝纲愈废。戍边将领，皆受监军太监挟制。冯瑗见开原饷绌兵羸，动多掣肘，他深感责任重大，一旦失守开原，将成千古罪人。但明廷腐败难挽，自无回天之力，遂郁郁成疾，便托病辞官归里，年仅44岁。家居期间，每与友谈及开原之事，辄嗟叹不已。当事者几次荐其起复，他皆谢绝。后仅数年，开原失守，明军更成败势，时人服冯瑗先见之明。

冯瑗辞官归里后，曾在冶源西南老崖崮村西南虎头山龙王庙内隐居，在庙东侧悬崖镌刻“轰雷溅雪”四字，以描绘此处峡谷泄洪的宏大景观。他著有《黄龙纪事》、《开原图说》等。在《青州明诗钞》中，选录其诗多首。其《园居即事》第六首，直抒辞官归来之心情：

“辞官归来四壁空，闲愁总不上眉丛。
 云霄自信无知己，丘壑谁怜有冥鸿？
 户外峰峦遥作障，湖中烟雨半为虹。
 春来浑似王猷棹，才出剡溪兴便穷。”

山东省博物馆现藏有冯瑗诗《九月九日登云岫阁有怀冶水浮山而作》书法作品，字体遒劲苍老，法自《兰亭》，意境苍凉，笔翰高妙：

“风雨重阳惨不欢，客愁无奈怯衣单。
 悠然坐见南山色，手把黄花不忍看。”

冯瑗家居10年，郁郁寡欢，53岁卒。

有明一代，自冯裕起，父子三进士、两举人；又“五代七进士”（包括冯士标，因其乃明朝进士清朝官，后文详述），皆有作品传世。为举人而有作品传世者，亦有多人。如惟健次子冯子咸，著有《日进杂记》、《自警私课》、《读礼钞记》和《耕余笔谈》等；冯珣著有《韞璞斋稿》；冯士衡曾任浙江孝丰知县，贤声素著，以《西苑诗》书法传世……临朐冯氏文学世家自明中而兴，家学门风，代不乏人，百余年间，著作如林，当时即已遐迩闻名矣。

（二）清初大学士执掌文柄

家风、学风，自古不乏世袭传承之例。临朐冯氏人物，由明到清，“祖孙绍继，为文为诗，建旗天下，泽被广远”，“文学世家”风气不衰。

冯士标（1610—1655年），字端明，号宗尼，惟健曾孙。他幼有奇才，抗爽不羁。年稍长，淬厉于学，读书多至丙夜。30岁中进士，尚未授官，父病危，请假驰归，丁忧守孝三年。明亡，清立，士标在清顺治二年（1645年）以明末进士参加清廷谒选，当被中式，授官兵部武选司主事，仅月余，升陕西按察司金事分巡关内道，即为四品大员。又迁右参议兵备庄浪道（辖今甘肃兰州至武威一带）。他勤政爱民，在蒙、藏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大修学宫，日与诸生讲释儒家经典，并常常自作范文以示。于是，此地之人始知向学。士子们争相传诵士标文稿，以宗法之。后人有评价：此地文化之兴，实赖士标倡导之力。士标又任四川建昌兵备副使，母丧丁忧三年，起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他途中染病，自谓：“盘错之际，乃显臣节，岂敢以衰病为念耶？”遂强拖病体以行，至浙江，卒于驿舍，年仅46岁。

士标诗文俱佳，曾有《西征记》行世，惜已佚失。

冯溥（1609—1691年），字孔博，号易斋，又号云海，士衡次子，惟訥五世孙。他幼负才华，年稍长，穷极经史，凡天文图纬及兵书地志，无不博览。30岁中举，时逢鼎革。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初次举行科考，诏前明举人一体会试。冯溥应试，考中贡士，却因故误了殿试。次年加恩科，冯溥进京补殿试，遂成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继升编修、秘书院侍读学士、直讲经筵，为帝辅导师。又升吏部右侍郎，转左侍郎。他兢兢业业，甚得年轻的康熙帝的倚重。曾任会试副考官，擢都察院左

部御史，升刑部尚书，康熙十年（1671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理刑部。次年，64岁的冯溥上疏乞休，康熙帝对这位助其铲除鳌拜的主要谋士依依不舍，批曰：“卿六十四未衰也！七十乃休耳。”他连续18年为会试正考官，世传其爱才如命，一遇贤才，便竭力荐拔，多为文人敬重。他力荐魏象枢等人，尤为例证。据《临朐县志·冯溥传》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为会试正考官，适奉诏初试博学鸿儒，溥所荐法若真、曹溶、施闰章、沈珩、叶舒崇、曹禾、陈玉璫、米汉雯等，各授侍读编修。”《四库存目提要》也载：“康熙己未（1679年）诏试博学鸿儒，（冯溥）与高阳李霁、宝坻杜臻、昆山叶方霭，四人同为阅卷官。”“而毛奇龄、朱彝尊、陈维崧，一时皆出其门下。”王士禛自称乃其“门下士”（《临朐县志》）。一大批有才之士，为其举荐重用。故高珩在《佳山堂诗集序》里写道：“千载一时，而侧席幽人。风云蔚起四海，人才一时罗之金门玉堂中。”由此可见，清初一大批新诗人的出现，不能说与冯溥的慧眼识才和擢拔无关。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清初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若谈冯溥的诗作，亦继承其家学诗风——作诗不求雕饰铺华，而有幽雅淡泊之气。尤其是其描写边塞风光之作，意境苍劲悲凉，凄婉感人。如《再寄李吉津辽左》四首其一：

“十月风吹塞角哀，行人泣望李陵台。

饥鸟啄雪群孤立，此代曾淹异代才。”

此诗中对清统治集团兴师动众而劳民伤财蕴含着谴责之意，不乏正义之感。清廷数兴文字狱，冯溥身为清廷重臣，敢写此诗，实属难能可贵。故施闰章在《佳山堂诗集序》中评论冯溥的诗：“出入三堂、乐府，五言古尤有汉魏遗风。其忧时悯事，不无《小雅》凄侧之言，而读之怆然！”此论尤为确切。王士禛、陈维崧、方象英等十几人为冯溥的《佳山堂诗集》作序，赞扬其文风“承累家学，继文敏（冯琦）公之后，涵蓄演迤为巨儒”；又云：“二百年来，海岱间推学者，必首临朐冯氏。”这是当之无愧的。

尽管冯溥的诗文创作在当时并非均为上乘，但他主掌清初文坛，擢荐人才，开时代风气，已远远超过了其作品的影响。他也如其先祖——主张诗歌要吟咏“真性情”，受到他周围文人们的由衷赞赏和推崇。陈玉璫在《佳山堂诗集序》中说：“夫子之诗，求之性情，已工。”毛端士也为作序评曰：“夫子起而振衰式靡，为狂澜砥柱，调尚正声，体从《大雅》，必凌宋铄元，而宏意亮节，依然汉魏、三唐之遗响矣！”此论虽非全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冯溥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振兴清初诗坛起了重要作用。

在清廷初立之际，明季诸生曾相约不仕清廷。而冯溥见腐败明朝既亡，清朝一如金、元之立，江山已固，就毅然参加清廷会试，并为高官。这就引起了许多明季诸生的不满，甚至为其编排了诸如“康熙帝娶其妹，而冯溥谋为国丈”等谣言，以图中伤之。冯溥听若弗闻，聊博一哂。其实，他一向极注重自己的名声，尤注重家族与乡里的邻舍关系。如：青州冯府与另一宦第房可壮府对面为邻。房府曾在重打院墙时将墙基向街心移动，以扩大自己的宅院面积。冯府管家出面干预，并寄书京都，意在让主人冯溥以官势弹劾房可壮。但冯溥却在回信中引用了明代杨慎（1488—1559年，字升庵）的一首诗：“千里修书为一墙，让他三杆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有意将原诗中的“三尺”改为“三杆”，须知这“三杆”就合今日4.8米，此数不可谓小。房府见冯府拆原墙后让地三杆，又得知冯溥信中的让墙诗，乃大感悟，也将院墙后迁三杆，这就形成了宽绰有余的“伙巷街”，在